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10220051300092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仪礼·士丧礼》、《既夕礼》所反映
的丧葬制度研究

On the Funeral System Reflected in *Shisangli* and *Jixili* in *Yili*

朱 蔚

指导教师姓名: 刘 钊 教授

专 业 名 称: 历 史 文 献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8 年 6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8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8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8 年 6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中文摘要

《仪礼·士丧礼》、《既夕礼》是“三礼”中记载先秦两汉丧葬制度最详细的传世文献，自流传以来，学人从传统经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名作不断。由于其所记载的丧葬制度的特殊性——实用性及时代性，为我们提供了以传世文献与考古出土实物相结合，对其所反映的先秦两汉丧葬制度进行研究的角度。

本文在广泛吸收前人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重新谨慎细致地释读了《士丧礼》、《既夕礼》文本，结合先秦两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尤其是新近的出土资料，以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士丧礼》、《既夕礼》所反映的先秦两汉丧葬制度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章节设置如下：

绪论：综述先秦两汉丧葬制度以及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指出已有研究成果的缺陷与不足，并规划出本文写作目的、思路框架以及采用史料范围。

第一章 棺槨制度：在追溯棺槨及其制度起源、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新近出土资料，择取棺饰中悬鱼等具体名物加以探讨。

第二章 尸体装殓：在追溯尸体装殓起源、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马王堆一号汉墓等保存较好的墓葬实例对文献所记载的幘目、握手等具体名物加以探讨。

第三章 随葬器物：择取若干学术界研究较少的丧葬竹器、木柩等具体名物加以探讨，对若干器物命名进行商榷。

余论：在上述三章论述的基础上，根据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对比结果，对《士丧礼》、《既夕礼》的作者、成篇时代等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关键词：士丧礼；既夕礼；丧葬

Abstract

Shisangli and *Jixili* in *Yili* are literature with the most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funeral system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Han Dynasty. And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and excellent researches on them since the spread of them.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n practicability and contemporaneity of the funeral system they record, they also provide us the possibility to research the funeral system from the angel of combin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with unearh objects.

On the basis of widely absorbing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aiming at the weakness of them, this paper seriously reads *Shisangli* and *Jixili* and rich achievements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Han Dynasty in archeology, especially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Then it do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funeral system, combining the literatu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and the materials of archeology. This paper falls into five parts.

Introduction: summing up the funeral system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Han Dynasty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bout it, pointing out the limitation and shortage in the prese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n pointing out the writing purpose and outline of this paper.

The first chapter, system of coffin: on the basis of retrospection 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ffin as well as its system, discussing some of the ornaments of coffi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materials of archeology.

The second chapter, encoffining: on the basis of retrospection to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coffining, discussing *Mingmu* and other things according to No. 1 Chu Tomb at Mashan of Jiangling and No. 1 Han Tomb at Mawangdui.

The third chapter, funerary objects: discussing the bamboo works and the carpentry used in the funeral, and deliberating their names.

Epilogu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hapters above, discussing the writer and the writing time of *Shisangli* and *Jixili*.

Key Words: *Shisangli*; *Jixili*; funeral.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先秦两汉丧葬制度概述	1
第二节 学术史研究回顾	2
第三节 本研究的方法、思路、史料及内容结构	4
第一章 棺槨制度	5
第一节 棺槨的出现及制度的形成、发展	6
第二节 棺 饰	9
第二章 尸体装殓	23
第一节 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尸体装殓	23
第二节 尸体装殓相关问题的探讨	25
第三章 随葬器物	31
第一节 丧葬竹器考	31
第二节 木桁考	38
余论：再论《士丧礼》、《既夕礼》作者、成篇时代	48
参考文献	51
后 记	59

绪论

第一节 先秦两汉丧葬制度概述

丧葬礼俗是人类为自身而进行的一项古老而永恒的仪式，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及精神世界最集中、生动的反映，其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与传承性自不待言。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前，有关丧葬礼俗的起源只能依据口耳相传及推测，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言：“盖上世尝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①根据我国现有考古发现，丧葬礼俗的起源至少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遗址，其下室发现有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及一些随葬品。对死者有意识地加以埋葬，反映了山顶洞人对死亡的幻想与精神寄托，从而成为我国丧葬文化的滥觞。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大规模氏族公共墓地，如黄河中下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一般流行的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且因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后期同一墓地中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的强烈对比，充分说明了现实社会中逐渐兴起的等级观念在死后莹域中的延续。

夏商时代，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即已向系统化、程序化方向发展，饭含、棺槨、明器制度皆已出现且初具规模。^②在商代，自槨室宏大、随葬品丰富的“亚字形”和“中字形”商王陵墓，至规模稍逊的“甲字形”贵族坟墓，继而大量一席裹身的平民墓葬，已充分显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严格的阶级和等级差别。西周以降，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所谓“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及“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的丧葬制度曾在局部地区被严格执行过，这充分表明以多层套棺、鼎彝礼器为特征的丧葬等级制度的日臻完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丧葬体制基本承袭周制——即普遍流行长方形竖穴木棺、木槨墓，但在具体丧葬礼制等级上往往出现僭越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礼制文献的总结与整理，不仅保

^①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② 罗开玉：《中国丧葬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留了丧葬制度的完整记录，更将其主张的“孝悌”等伦理思想融入至丧葬礼仪体系中。^①

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长方形竖穴式木椁墓。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仍沿袭周代严格的等级礼制，有些汉墓还使用了“黄肠题凑”。但从西汉中期开始，墓室在建筑材料上逐渐以砖、石为主，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继而普及到各地。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墓制一次划时代的变革，至此，以多层套棺、鼎彝礼器为特征的先秦丧葬制度在延用几千年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②

第二节 学术史研究回顾

《仪礼·士丧礼》、《既夕礼》二篇是“三礼”中最为系统全面记载先秦两汉丧葬制度的传世文献。作为《仪礼》一书的重要篇目，历代对其进行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名作不断。据统计，历代研究《仪礼》的文献约有 500 种之多，尤其仅清代的研究著作就超过 200 部。^③而从文献学角度有关版本、校勘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复不少，如沈文倬先生的《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④等文，鞭辟入里，发宏阐微。

在众多有关《士丧礼》、《既夕礼》的研究文章中，陈公柔先生独辟蹊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利用当时已有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撰写出了《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⑤一文，成为利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仪礼》的典范。该文在棺椁制度、名物制度以及《士丧礼》、《既夕礼》成篇时间断定等方面多有建树。不过也正如沈文倬先生在《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⑥一文中所言，该文在部分具体问题的考证上存在着牵强附会的地方。

继陈公柔先生一文后，学界利用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研究《士丧礼》、

① 王计生：《事死如生——殡葬伦理与中国文化》，百家出版社 2002 年，第 7 页。

② 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说》，《考古》1981 年第 5 期，第 449-458 页。

③ 邓声国：《清代〈仪礼〉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2 页。

④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十五辑，中华书局 1979 年，第 27-41 页。

⑤ 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 年第 4 期，第 67-84 页。

⑥ 沈文倬：《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考古学报》1958 年第 2 期，第 29-38 页。

《既夕礼》者不乏其人，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根据现有墓葬发掘资料对文献所反映的墓葬制度进行讨论与研究，尤其在棺饰方面颇有建树，如论文《墙柳与荒帷——1983-1986年沔西发掘资料之五》、^①《战国时期楚国丧礼中的棺束与棺饰》、^②《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③专著《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④《仪礼士丧礼器物研究》^⑤等；二为对《士丧礼》、《既夕礼》所记载丧葬仪节的总结与探讨，清代对丧葬仪节的研究集中于宫室方面，而现有研究成果已不仅仅局限于此，如论文《再论“葬日遣奠的奠器是否送于圻内”》、^⑥专著《仪礼士丧礼既夕礼仪节研究》。^⑦除此之外，其它一些通论性论文、著作如《试论先秦两汉丧葬习俗的演变》、^⑧《先秦丧葬制度研究》、^⑨《汉代丧葬制度》^⑩等亦有涉及。以上均是根据最新出土材料对陈公柔先生《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一文极好的补充。

学界在《仪礼·士丧礼》、《既夕礼》研究上欣欣向荣的局面令人欣慰，但存在的问题亦不可忽视，总的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陈公柔先生一文成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间较早，因当时出土资料以及发掘、认识水平的限制，今日看来该文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其次，学界虽然已根据近来考古发掘资料对该文加以补充且不乏富有新意之作，但从整体来看，《士丧礼》、《既夕礼》所反映的丧葬制度这一课题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大陆方面的学术研究更为欠缺。

再次，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存在一些器物命名上的错误，究其原因，乃是与文献记载考证不足。

① 张长寿：《墙柳与荒帷——1983-1986年沔西发掘资料之五》，《文物》1992年第4期，第49-52页。

② 江奇艳：《战国时期楚国丧礼中的棺束与棺饰》，《考古》2004年第6期，第79-87页。

③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纪烈敏等：《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年第10期，第47-50页。

④ 郑良树：《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⑤ 沈其丽：《仪礼士丧礼器物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⑥ 江奇艳：《再论“葬日遣奠的奠器是否送于圻内”》，《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年第26卷第8期，第52-55页。

⑦ 徐福全：《仪礼士丧礼既夕礼仪节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0年。

⑧ 高崇文：《试论先秦两汉丧葬习俗的演变》，《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第447-472页。

⑨ 李玉洁：《先秦丧葬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⑩ 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沈阳出版社2003年。

第三节 本研究的方法、思路、史料及内容结构

鉴于学术界在《仪礼·士丧礼》、《既夕礼》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重新谨慎细致释读《士丧礼》、《既夕礼》文本，结合先秦两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尤其是新近的出土资料，以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印证的方法，对《士丧礼》、《既夕礼》所反映的先秦两汉丧葬制度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研究范围主要是《仪礼·士丧礼》、《既夕礼》所反映的先秦两汉丧葬制度，因此在文献方面，主要以《仪礼·士丧礼》、《既夕礼》及“三礼”有关丧葬制度的文本为主，旁及部分先秦两汉及后世研究文献，凡下文所引用的《周礼》、《仪礼》、《礼记》^①“三礼”文献均为中华书局版本，《仪礼注疏》、《礼记正义》^②均据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而所引用的考古资料，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至2007年12月见诸报道的中原地区先秦两汉考古发掘资料为主，同时部分采用西北等边缘地区考古发掘资料。

本文在具体章节的设置上除绪论外将细分为棺槨制度、尸体装殓、随葬器物以及余论共四大部分。棺槨制度、尸体装殓两章将在分别叙述其起源、发展的基础上，择取棺饰、握手等具体名物加以探讨分析；随葬器物一章将选取诸如“木柎”等若干学术界研究较少或仍有探讨余地的丧葬器物作专题研究。总的说来，上述三大部分将采取详略有别的叙述方式，首先建立准确无误的文本释读基础，其次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的对比、辨析，以印证传世文献的记载——或订正错误，或补其不足；同时亦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对若干出土名物的定名进行商榷。全文通过考察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的是否吻合，在余论部分中将利用上述三个章节的结论对《士丧礼》、《既夕礼》的成篇背景、成篇时代、作者等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的论题作综合的分析。

① 《周礼》，《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仪礼》，《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礼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汉）郑玄、（唐）贾公彦：《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第一章 棺槨制度

葬具指装裹死者尸体的殓具，是丧葬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随丧葬习俗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传承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地域又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说文·木部》“棺，关也，所以掩尸”，“槨，葬有木槨也”，^①段注：“木槨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②许慎对“棺”、“槨”的定义属狭义上的木质葬具，广义上的葬具在材质上应有石、木、陶之分。石质与陶质葬具产生较早，在我国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最早的石质葬具可追溯至距今七、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墓地中的3座石板墓。^③陶质葬具一般被称为“瓮棺”，最早出现于老官台文化的墓地中。不过纵观当时华夏大地上与兴隆洼文化、老官台文化并存的裴李岗文化、^④后李文化、^⑤大地湾文化、^⑥北辛文化、^⑦彭头山文化、^⑧顶钵山文化^⑨等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墓葬，可以发现葬具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25页。

②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0页。

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④ 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第73-79页；开封地区文管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3期，第197-20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4期，第337-340页；临汝县博物馆：《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6年第6期，第481-48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第577-585页；郑县文化馆：《河南郑县水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9年第6期，第562-56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郑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第39-77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⑤ 济青公路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2期，第97-112页；王守功、宁荫堂：《小荆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1994-03-27。

⑥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第1-8页；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零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第1-4页；甘肃省博物馆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1期，第1-14页；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第21-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第297-328页；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第1-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巴蜀书社1994年；商县图书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第33-47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159-1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汶上东贾柏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第481-487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山东大学考古研究所教研室：《山东邹平苑城西南庄遗址勘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第1-12页；济青公路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2期，第97-112页；青州市博物馆：《青州新石器遗址调查》，《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4-140页；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的出现极为少数，大多流行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以较典型的裴李岗文化墓葬为例，在迄今清理的约 750 座墓葬中，除个别墓为圆角长方形、长椭圆形外，绝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没有发现葬具的使用痕迹，即将尸体直接放置于挖好的土坑中埋葬。^③

因此从整体上看，虽然石、陶质葬具出现较早，但石棺、石槨只在边远地区局部流行且缺乏发展的连续性和系统性；而瓮棺则主要用于埋葬未成年人，在全面反映社会内部等级差异方面相对较弱，因此在我国历史悠久的丧葬制度中，石质及陶质葬具始终没有成为葬具的主流。木质葬具即狭义上棺、槨的出现明显晚于上述两类葬具，但其却逐渐成为葬具发展中的主流，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打上了社会分层的烙印，使得棺槨制度体现着社会内部深刻的分化与发展。因此，本章所讨论的棺槨制度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木质葬具。

第一节 棺槨的出现及制度的形成、发展

一、有关棺槨及其制度的文献记载

在文献中，棺槨常常并称，如：

《管子·立政》：“死则有棺槨、绞衾、圻墜之度。”^④

《礼记·檀弓上》：“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是故衣足以饰身。

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树之哉！”郑注：“皆言所以为深邃难人发现之也。”

《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郑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

第 31-45 页；南京博物院：《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 1986 年发掘》，《文物》1991 年第 7 期，第 10-27 页；谷建祥、尹增淮：《江苏沐阳万北遗址试掘的初步收获》，《东南文化》1988 年第 2 期，第 49-50 页；南京博物院：《江苏沐阳县万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 年第 1 期，第 124-133 页；胡秉华：《兖州县西桑园北辛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 年）》，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第 169-170 页；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62 年第 3 期，第 111-116 页。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 8 期，第 17-29 页；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 年第 1 期，第 1-11 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2 年秭归县柳林发掘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江汉考古》1994 年第 1 期，第 1-12 页；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2 期，第 41-51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 1997 年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 年第 11 期，第 11-33 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 年第 5 期，第 295-302 页。

③ 李友谋：《裴李岗文化》，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第 110-127 页。

④ 《管子》，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第 15 页。

大夫一重，士不重。”

作为竖穴土坑墓最常见的葬具，棺槨在传世文献中的记载最早只能见于战国时期的著作中，但在考古发现中原始棺槨此类葬具的出现却早得多。

二、考古发现的棺槨

由于年代久远及保存条件的限制，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暂无木质葬具的出现，虽然在舞阳贾湖遗址墓地中 M376 存在生土二层台，但此墓浅仅 0.5 米，应不可能有木质葬具的遗留；^①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 M152 亦发现清楚的葬具痕迹，是用长短宽窄不同的木板插在人骨周围，略作长方形，并在木板外部自然形成“二层台”，虽然报告编写者将之称为“棺”，^②但此墓在整个墓地中乃是孤例。比较明确的木质葬具出现于大汶口、野店、呈子三处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以大汶口遗址 1959、1974、1978 年 3 次发掘为例，共清理出 179 座墓葬，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大致勾勒出木制葬具的发展历程。早期的墓葬，以大墓 M2005 为例，该墓为长方形土坑墓，坑内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台壁虽未见板灰，却有一层黄色胶泥，墓室底部又挖有盛卧人体的长方形葬坑并涂抹胶泥，报告编写者认为这是棺的雏形。至大汶口文化中期，这种形式的墓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 M53 为例，该墓有 0.3 米高的二层台，葬具木灰即盖在二层台所构成的坑口上，正中一根南北方向横置的原木把它分为两段，上各有东西向并排放置的四根原木，揭去木灰，其下为容人架的长方形坑。如果说这种仅在坑口搭放原木然后覆土掩埋的形式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葬具，那么 M94 就已出现后世木棺的祖型，该墓顶、底、四壁均铺有原木木灰，人架即置放其中。而至大汶口文化晚期，“井”字型木槨亦已出现，这类墓有顶和四壁，有的底部有排列稀疏的枕木，四壁由原木卧叠而成，四角交叉，俯视作“井”字型，推测其四角的处理可能是将原木刻上凹口，上下互相咬住，或用绳子扎固，顶部亦用原木搭铺，此类墓葬以 M126 保存最为完整。^③

大汶口文化中期，即距今 5500—5000 年间我国出现原始木质葬具的使用，这种现象在当时华夏大地上并非孤例，如太湖流域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晚期许多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71 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63 年，第 215 页。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第 5-7 页。

大型墓葬中见有朱红痕迹,推测为涂朱的棺木或衣服腐烂后的遗留,以 M14 为例,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发现边、底均呈弧形的独木舟状木质葬具痕迹。^①

龙山文化时期,葬具已多见,如泗水尹家城遗址出土龙山文化墓葬 65 座,明确有木质葬具者达 30 座,接近半数。其葬具木椁的结构平面呈“井”字型,系采用略为加工的原木制成,四角的结构虽不明,但根据伸出角部之外的高度分析,可知纵横两根椁木的交接处是经过特殊加工的。而这一时期棺的结构亦趋于复杂,从平面看主要有 3 种形式,即“井”字型、“Ⅱ”字型以及“口”字型。^②龙山文化中期偏晚的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重椁墓则将这一时期棺椁的构造推至极致,该墓为长方竖穴,四周墓壁规整,墓室内的葬具为两椁一棺,并设有“脚箱”与“边箱”。内、外椁整体均呈“Ⅱ”型,内椁南面置棺,并随葬包括玉、骨、陶等在内的 54 件制作优良、形制精美的随葬品。^③与西朱封规模类似,时代亦相去不远的大墓尚可见于上海福泉山、浙江余姚反山以及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充分说明在龙山时代的华夏大地上,从考古发掘反映出来的墓葬体制正发生着带有时代色彩的社会现象。

虽然有制作精美的多重葬具出现,但从整体数量、质量来说,龙山时代的木棺形制尚不规整,木椁虽经过一定的加工,但仍比较粗糙,且出现棺椁并用的墓葬很少,因此只能说龙山文化时代是棺椁制度的萌芽时期。^④

早商时期的墓葬迄今已发现数百座,根据已有考古发现,该时期的墓葬形式仍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且经常以木质棺椁作为葬具。但已有发掘资料亦表明,早商时期的墓葬已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区别,大致可分为五大等级:第一类墓墓坑宽大,棺椁齐备,使用多个殉人,随葬大量青铜器以及权力象征的铜钺等,此类墓葬以盘龙城李家嘴墓地 M2 为代表;第二类墓葬比第一类规模稍逊,一般有木棺,随葬少量青铜容器,如琉璃阁 M110,南北长 2.1 米,宽 0.8 米,随葬鬲、爵、觚等 8 件铜器以及 2 件玉器;第三类墓坑稍大于人骨,多无木棺,随葬单件铜器以及成组陶器,如铭功路 M150;第四类墓葬仅随葬陶器,如垣曲商城 M3;第五类墓葬墓坑仅能容身,一般无随葬品。如此墓葬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128 页。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第 43 页。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文物保管所:《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 1 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219-224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 年第 7 期,第 587-594 页。

④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第 157 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